加快发展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

以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赋能文化强省和经济大省建设

□郭跃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依托丰厚独特的文化资源和产业优势，加快发展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新型文化产业，拓展科技创新赋能文化建设的新场景、新路径，促进文化事业大繁荣和文化产业大发展，是广东锚定“走在前列”总目标、推进文化强省和经济大省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发展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物质富足的现代化，也是精神富有的现代化。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必须提升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量能和质效。新质生产力源于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提升是其核心标志，创新是其特点，质优是其关键，本质就是先进生产力。发展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坚持以数字为载体，以互联网为空间，以5G、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AI大模型、数字孪生、3D投影等信息技术为工具，能更有效率地促进文化创造，推动文化事业和产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业态，以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供给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推动国家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繁荣大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实现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

二、发展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广东具备“走在前列”的产业基础优势、创新资源优势和体制机制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建设成就斐然，文化建设更是气象升腾。早在2003年，省委、省政府就作出了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2010年，开始规划部署文化强省建设。步入新时代以来，广东深入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谋篇布局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2023年6月，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作出“1310”具体部署，把“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努力交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份好的答卷”列为必须取得的十大新突破任务之一，对不断丰富高品质文化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建设好展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窗口作出部署。发展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广东具备“走在前列”的产业基础和科技优势、体制机制优势。

一是产业基础优势。近年来，广东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发展优势产业，积极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新业态集群，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全省GDP比重超过5%，是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十三五”期间，全省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从2016年的4256.63亿元增加至2020年的6210.6亿元，约占全国总量的1/7，年均增速超过10%。2023年，全省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2483亿元，占全国的17.36%，连续20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在数字技术的加持赋能下，广东形成了龙头突出、门类齐全的文化产业布局，新闻、出版、电影、演艺娱乐等传统文化产业实现转型升级，4K/8K影视、数字出版、网络视听、动漫游戏、数字文化装备制造等新型文化业态集群异军突起，智慧广电、智慧出版、电竞、直播短视频、云游戏、云音乐、云演艺等战略性新兴文化产业前瞻布局。2023年，在文化产业9大门类中，广东有7大门类的营业收入全国占比超过10%。体量大、头部强、门类全，是广东文化产业的鲜明特征。

二是创新资源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培育和发展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关键在科技创新体系、产业创新体系、成果转化体系等创新资源的集聚。广东区域综合创新能力持续多年领跑全国，企业协同创新加速推进，教育体系、研发经费、人才集聚等创新要素整合力不断提升，构成了丰富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资源禀赋。以“文化+高科技+产业资本”为主要特征和发展模式的文化科技产业、数字文化产业，极大地提高了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和文化产品的附加值。而日益深化的新时代文明实践，覆盖城乡、体系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实践，富有岭南韵味、时代风采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创作实践，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

三是体制机制优势。体制机制等体系支撑是新质生产力发展孕育的沃土，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动机”和“加速器”。广东携手港澳推进大湾区市场一体化建设，加快打造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打造高水平开放门户枢纽；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高效协同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打造“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这些举措有力地打通了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厚植了培育和发展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新优势。

三、积极培育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推进岭南文化“双创”工程

当前，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前沿技术广泛应用到文化产业领域，正在重塑舆论生态、传播形态、文化业态。培育好文化领域的新质生产力，要创新思路、形式、载体，用更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供应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相互促进，在以文培元、以文化人、以文弘业、以文传声中做大文化产业规模，打造文化产业数字化的重要高地、文化新业态的策源地、文化产品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以文化强省有力支撑经济大省挑大梁。

扭住三要素，全面培育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培育新质生产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要扭住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要素下硬功夫。**要培育文化领域更高素质的劳动者。**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要畅通科技、教育、人才的良性循环，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打造高水平的文化领域科技人才队伍。**要孕育文化领域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优化提升文化产业链价值链。要通过“文化+”和“+文化”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催生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等新质生产力，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前沿技术，推进文化产业数字化，建设岭南文化大数据体系，抢占文化产业制高点。要推进文化科技深度融合，加快构建高效协同的文化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一批文化领域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要创新文化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的平台和渠道，加速重构文化生态、应用场景和发展模式。要大力实施传统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工程，借助现代技术，大力推动岭南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发展红色文化，增强岭南美术、广东音乐、粤剧等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凝聚力、感染力。**要拓展文化领域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得益于科技创新的广度延伸、深度拓展、精度提高和速度提升，劳动对象的种类和形态大大拓展。要用好广东文化产业门类齐全、创新资源丰富的产业基础，全方位培育和发展广东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要持续打造一批文化科技融合的领军企业、特色企业、“链主”企业和“隐形冠军”、文化独角兽企业以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群，锻造一支引领全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科技粤军。建设覆盖全省的国有出版物发行网络、广播电视传输网络、数字电影院线以及演出院线，发展基于互联网、物联网的新型文化市场流通形式。

把握“人文湾区”建设机遇，力促形成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要以岭南文化为纽带，促进粤港澳三地扎实推进“共建人文湾区”，推动大湾区文化创新协同发展，增强大湾区文化软实力。要坚持文旅融合，依托大湾区特色优势及香港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构建文化历史、休闲度假、养生保健、邮轮游艇等多元旅游产品体系，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的地。要发挥大湾区中西文化长期交汇共存等综合优势，促进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合作，实现美美与共。要紧紧依托广东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额约占全国五分之二、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优势，持续扩大文化产品和服务“扬帆出海”的力度和规模，倾力打造对外文化交易的重要阵地，建设展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窗口。要强化广州、深圳的带动效应，高标准建设广州、深圳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以及省级基地，培育一批文化高新技术企业，打造全国文化科技应用示范中心。支持广州打造动漫游戏之都、全球创意城市和文化装备制造中心，支持深圳大力发展时尚产业，打造设计之都、国际文化创新创意先锋城市，带动全省文化产业，形成百舸争流、百花齐放之势。

统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断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发展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必须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要牢牢把握守正创新的要求，守住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住“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住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深入实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工程，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凝聚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广泛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通俗化的理论宣讲，打通理论宣传“最后一公里”，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要深入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全域文明创建工程，大力推动岭南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发展红色文化，涵养向上向善、刚健朴实的文化，以思想之光、文化之光激发全省干部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理响广东 ·岭南文论

扩大居民消费重在创造新需求

□田秋生

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结合起来，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提升消费结构，培育新型消费业态。

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拉动力，并从根本上决定着企业投资需求。当前部分企业销售遇到困难、一些民间投资减弱、经济增长需求拉动力出现不足，无疑需要扩大居民消费。但扩大居民消费，重点不是简单地增加消费者对现有过剩物品的需求，而是致力于开发新供给、创造消费者新需求。开发新供给、创造消费者新需求，也是贯彻落实9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结合起来的一种要求和途径。

今天部分企业遇到销售困难，不是因为现有需求不足，而是现有供给过剩

企业销售遇到困难，可能是因为需求不足，也可能是因为供给过剩。如果是因为需求不足，正确的思路和选择当然就应该是扩大消费需求；如果是供给过剩，正确的思路和选择则应该是压减过剩供给，并开发创造消费者新需求。

从相对意义上讲，供给过剩可以说是需求不足，需求不足也可以说是供给过剩。但是，从绝对意义或最终成因上讲，情况就不同了。供给过剩未必就是需求不足，需求不足也未必就是供给过剩。事实证明，今天我国部分企业销售困难，主要不是因为现有需求不足，而是因为现有供给过剩。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前，如199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为2.1万亿元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感到消费需求不足，而今天，如2023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加到了47.1万亿元的时候，我们反而却感到消费需求不足？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没有遇到消费需求不足，不是因为消费需求比今天大，而是因为总供给远比今天小；今天我们遇到消费需求不足，不是因为今天消费需求比过去小，而是因为今天总供给远比过去大。

克服企业销售困难，必须开发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生产是为了消费（或需求），而消费（或需求）不是为了生产，这是一个常识性的、不能颠倒的基本逻辑。它告诉我们：只能且必须让生产或供给去适应和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而不能扭曲人们的消费需求去适应或匹配产品的供给。这进一步告诉我们：如果企业销售遇到困难，问题不是出在需求方面，而是供给方面，供给超过了人们的实际需要（或购买能力），或者不符合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克服企业销售困难，必须压减过剩供给，开发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认为人们的消费需求是无限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会接连产生新的消费需求，就此而言，可以说人们的消费需求是无限的，但是，就具体项目而言，如食品、衣着、家电、住房、日常生活用品等，人们的消费需求不可能是无限的。特别是在今天，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已经或正在发生阶段性重大变化，吃穿住行用等基本消费项目的需求，整体而言，已接近人们自身的实际需求量，很多现有物品需求的扩张空间已经不大。

如果一味地通过各种手段促使人们增加对现有过剩物品的购买，不仅会违背“生产是为了消费而消费不是为了生产”这一基本逻辑，还会增大而不是缓解企业销售困难和经济下行压力。因为它会扭曲价格信号，干扰市场机制的作用，促使企业进一步扩大生产、增加供给，最终必然会造成更大的供给过剩。

今天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更依赖于供给的创新

消费者的消费，有些产生于人类自身，如人类对于食品、健康、美容、娱乐等项目的消费，有些产生于生产者的创造，如汽车、家电、手机、高铁或航空出行等项目的消费。当今时代，人类全部消费项目中由生产者创造的部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消费对生产者之创造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开发和创造消费者新需求，成为扩大居民消费的重点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取向。

而且，应该认识到，在目前收入和物价水平下，不少人在满足了基本消费项目支出后，还有收入剩余，能够支撑一些发展享受性消费项目的需求。而发展享受性消费项目的需求与基本的生存性消费项目的需求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基本消费项目的需求，大多是与生俱来的，需要怎样的基本消费项目，消费者本人是清楚的，并且能准确地表达出来，不需要生产者的创造性开发。而发展享受性消费项目的需求，是后天产生的，需要怎样的发展享受性消费项目，很多消费者本人并不清楚，更不能明确地表达出来，完全依赖于生产者的创造性开发和设计。这就意味着，今天扩大居民消费，更须致力于开发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今天扩大居民消费，根本上可以归结为改善和创新供给。甚至可以说，经济增长的全部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满足或创造消费者需求的过程。

开发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是实现创造增长拉动力与增进民生福祉二者相统一的根本途径

扩大居民消费，直接动因是企业销售困难，但根本目的不是缓解企业销售困难。扩大居民消费的根本目的，是创造需求拉动力，促进经济增长，满足消费者需求，增进消费者福祉。这就决定了，扩大居民消费，必须坚持创造增长拉动力与增进民生福祉二者相统一，而不能为了扩大消费而扩大消费。

简单地压减过剩供给，显然不能实现创造增长拉动力与增进民生福祉二者相统一。简单地增加人们对现有过剩物品的购买，也不能实现创造增长拉动力与增进民生福祉二者相统一。它不仅不能从根本上缓解供给过剩和经济下行压力，反而还会制造更大的供给过剩和经济下行压力。事实上，只有开发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才是实现创造经济增长拉动力与增进民生福祉二者相统一的根本有效途径。新的供给的开发，本身意味着新的需求的创造，会给经济增长增添拉动力，同时，新供给的开发、新需求的创造，也必然会给消费者带来新福利。任何符合和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供给创新，都必然同时具有创造经济增长拉动力和增进消费者福祉的双重效应。

开发新产品创造新需求，须充分发挥企业家作用

企业家是开发新产品、创造新供给的重要主体。新产品的开发和生产，是有风险的，也需要智慧，只有企业家才敢冒这种风险并具有这种智慧。事实上，人们的消费需求，从实现或者被满足的程度来看，或者说从被开发或被创造的程度来看，根本上都依赖于企业家的创造。历史上每一次消费结构的升级或每一个新消费时代的出现，如从传统家电到现代家电，从自行车出行到汽车出行，从单功能旧式手机到多功能智能手机等等，无一不是由企业家创造的。

发挥企业家开发新产品、创造新需求的主体作用，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健全完善产权保护、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市场经济制度体系，最大限度激发企业家开发新供给、创造消费者新需求的动力。并持续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切实落实好扶持创新的财税金融政策，提高企业开发新供给、创造消费者新需求的能力。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第二个结合”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和文化根基

□曹艳红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认识提升到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进程。“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把我们党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提到了新高度，也把党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提到了新高度。“第二个结合”在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群众基础和文化根基方面，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第二个结合”具有鲜明的大众化特征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我们党肩负的重大战略任务和重要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的内涵和定位各有侧重，又互相关联、有机统一。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对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度与广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来讲，“两个结合”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紧密相连的重要命题。不论是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还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和内涵，但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角度看，又各有侧重。“第一个结合”侧重展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特征，强调实事求是，从当下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来准确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来解决时代提出的课题。“第二个结合”侧重展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征，着重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融通，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与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念联结贯通，深入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日用而不觉。“第一个结合”是把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植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际，“第二个结合”则是把融入本国、本民族具体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植根于本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沃土，更容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更能够深入内心。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不是凭空想象，而是从“第一个结合”提出之始就包含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一定会与人民群众原有的文化价值观念相遇，直至产生正向的化学反应，才能有机结合，才能有效指导中国实践，解决中国经济社会所面临的问题。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国的特性”“中国的特点”就同时包含了中国革命、中国历史文化的具体实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2014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就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之后又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更是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理论指向。

我们党从长期历史实践中充分认识到，植根于本国的具体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源动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尤其不能忽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和独特价值。关于如何宣传阐释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做到“四个讲清楚”，就更容易让广大党员群众更深入地理解“第二个结合”的内涵、价值和意义。

“第二个结合”既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激活、改造，并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文明因子，也是让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获得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中华文明的滋养，进而实现二者有机结合、双向互动、彼此成就。在“第二个结合”的引领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进程必将大大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必将拥有更深厚的文化根基、历史根基和群众根基。

“第二个结合”具有突出的思想解放的意义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争”成为中华民族仁人志士挽救民族危亡、寻求繁荣富强的思想论战，跨越近两百年历史长河，至今尚未完结。这期间，持全盘西化、自由主义者有之，持本位主义、复古主义者有之，持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补者有之，但均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救亡和伟大复兴实践中，持续推进真理本土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一系列伟大胜利。

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第二个结合”，认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在文化发展层面上，对如何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行的一次思想解放，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前景有了更广阔的文化空间，奠定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我们党的历史上，可以说有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以延安整风为代表，把思想从僵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进而打赢了解放战争，实现了国家独立。第二次以改革开放前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代表，把思想从僵化认识社会主义，特别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中解放出来，进而实现了国家富裕。这次是第三次思想解放，以“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为代表，把思想从僵化追随西方现代化中解放出来，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第三次思想解放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对从近代鸦片战争起就困扰文化界、且为大众所熟知的“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有效的破解之道。

衡量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始终离不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哲学问题。近两百年来，中华文化主体性从被他者俯视，到被自己否定，再到逐步恢复自我认同，经历了困苦挣扎的过程。我们国家曾经被动卷入了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体系，在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下，许多国人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美国化，把文化主体性和文化主动权拱手于人。但实现现代化离不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国式现代化既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指导，又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中华文化主体性重新确立、文化主动权重新掌握并巩固的一个关键性历史节点，标志着我们党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达到了新的高度。

“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1902年，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第二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不断发展到了新时代，面临新要求、新任务而提出的行之有效的科学指南，是正确处理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现实理论，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探索未知、冲破历史迷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清醒、自觉和坚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们可以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去进一步探索适合国情、面向未来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创新，让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世界作出新的贡献。

作者简介：曹艳红，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3年度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精神研究专项委托项目“‘两个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研究”（项目号：GD24WH07）